

社会建设

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及其思考

张连德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通过对皖北某县 189例农民工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农民工社会信任现状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各种社会排斥和信任机制缺失导致农民工群体社会信任危机,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可以通过增加农民工收入、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引导非政府组织建设、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的社会互动机制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信任危机; 信任机制; 社会排斥; 文化排斥; 经济排斥; 非政府组织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032X(2011)03-0062-05

Abstract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survey 189 migrant workers in a northern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and the population's social trust was then examined.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trust crisis resulted from all kinds of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lack of social trust mechanisms which is obviously unfavorable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The issue needs to be addressed by increasing their income,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s, enhancing their cultural and personal quality, introducing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erf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the harmonious soci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etc.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Trust Crisis, Trust Mechanisms, Social Exclusion, Cultural Exclusion, Economic Exclusion,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首次将“信任”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范畴,他认为,社会信任代表着一种力量,通过个人并为个人服务,通过人类的交往并为人类交往服务,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此后,虽然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对之进行研究,但共同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的生力军,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已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群体。如果他们不能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缺少对城市社会的信任,不仅会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将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当前农民工社会信任状况的调查,分析其生成的内在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农民工社会信任状况分析

(一)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为了解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我们于2009年1月~3月,采取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皖北地区砀山县的8个自然村展开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各村的返乡农民工。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9份,有效回收率为94.5%。被调查对象男性占61.4%,女性占38.6%;年龄以青壮年为主,16~45岁的占95.4%;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文化及以下的占82.7%,高中文化程度占11.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6.1%;职业方面大多数是建筑和企业工人,占63.2%,此外,小商贩占15.3%,打零工的12.8%,从事其它行业的8.7%;收入普遍较低,500元以下的占3.6%,501~1000元的占13.2%,1001~1500元的最多,占40.1%,1501~2000元的有27.5%,2000元以上的15.6%。通

[收稿日期] 2010-11-19 [修订日期] 2011-03-03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资助青年项目(10YJC840090);淮北师范大学青年科研项目(700256)

[作者简介] 张连德(1981-),男,山东淄博人,淮北师范大学讲师,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城市社会问题。

过调查发现,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不容乐观。

(二)被调查农民工社会信任状况

1. 农民工对“人性善”不太认同,缺乏社会安全感

信任的前提是对他人未来行为或举止的期待,具有很大风险性。科尔曼(Coleman)认为,信任别人是件冒险的事,等于将自己拥有的资源主动放到他人手里。理性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增进至少不损害自己福利,在是否信任他人的问题上,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1]。对人性善恶以及他人失信可能性的判断是人们社会信任的前提。由此,我们设计了问题“多数人都是好的和善良的”。在回答中,只有 12.2% 的人表示“完全同意”,14.2% 的人表示“部分同意”,“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人却占到 38.4% 和 35.2%。可见,当前农民工对“人性善”不太认同,他们缺乏社会安全感,对他人持怀疑态度。

2. “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农民工信任的决定因素

信任是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心理现象,可以分为“私人信任”和“社会信任”。私人信任限于私人生活范围内,也称个人信任、特殊信任,是在个人活动中基于情感联系的信任。社会信任也称一般信任,它体现在所有交往关系之中,社会信任的范围已经超越亲人、熟人,具有超情感性,是一种普遍化的信任,它有别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个人信任。社会信任的基础主要缘于理性判断,更多地渗透了制度、结构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表现在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性生活和交往中^[2]。为反映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当您遇到重要问题希望找谁商量”一题,农民工的选择按比例依次是“家里人”(61.6%),“亲戚”(20.4%),“老乡”(5.9%),“工友”(7.9%),“关系密切的邻居”(3.3%),“陌生人”(0.7%)。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即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向外扩展的亲属关系网,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所及就发生联系^[3]。这种“差序格局”将一部分人称为“自己人”,另一部分人称为“外人”,对“自己人”给予高度信任,对“外人”则不然。从上面数据可以得知,“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交织作用依然是影响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主要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在农民工的私人领域及其在私人领域融入的情

况。也就是说,农民工的信任停留在个人信任上,缺乏社会信任。

3. 农民工的信任模式是关系信任,缺乏制度信任

社会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赖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契约等的帮助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社会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4]。卢曼(Luhmann)认为,信任可以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人际信任的基础是关系的远近亲疏,而制度信任是以制度化约束为前提,任何一方违背或不履行承诺都会受到制度规定的惩罚^[5]。因此,对制度的信任是社会信任的一个重要属性。我们以借贷现象中的契约为例来看农民工对制度信任的认同。当有人向你借钱时,“完全同意签订契约”的人占 47.7%，“同意与不太熟悉的人签订契约”的为 49.1%，只有 3.2% 的人表示“反对签订契约”。这说明农民已经具有了契约意识和制度信任的基础。但当问到：“当你的权益被损害的时候，你会不会找法院或政府？”农民工 W 回答：“一般不会，现在打官司都需要钱，你没钱去送礼，谁理你啊，除非你有熟人。再说，即使赢了，诉讼费、请客费什么的也不少”。跟关系信任相比，农民工对社会制度信任的水平仍然不高。

4. 农民工对集体合作缺乏认同,社会信任水平较低

社会信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或联系,社会信任水平可以体现在对集体合作的认同上。大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信任是在一系列社团、网络组织中结成的,来自于自愿性团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张维迎指出,发达的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大量的中介组织以有效的交易设施、信息传递系统和变一次性博弈为重复博弈来加大失信的成本,进而促进信任的建立。郑也夫也指出,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宗族和自愿性组织^[6]。对集体活动的参与可以直接反映农民工对集体合作的认同。为反映农民工的组织参与率 and 参与意识,我们设立的指标有:第一,对农民工组织的了解程度。回答“非常了解”的占 3.7%,回答“不太了解”的占 32.3%,回答“不了解”的高达 64.0%。第二,参与农民工组织活动状况。回答“经常参与组织活动”的有 11.1%,回答“很少参与组织活动”有 25.9%,回答“从未参与组织活动”的高达

63.0%。第三,参与组织事务的状况。“敢于提意见”的只有 10.1%，“郑重投票”的有 27.5%，“听之任之”的则有 62.4%。可见,农民工对组织缺乏了解,很少参加组织活动,也不积极参与组织事务,他们的社会信任度和认同感较低。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不容乐观,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进,会对农民工的生活和社会和谐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生成原因

本文认为,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形成是因社会排斥所产生的群体挫折感以及由社会转型导致的信任机制缺失相互交织、不断强化而最终形成的。

(一)社会排斥导致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

社会排斥是指社会成员希望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而被他们所不能控制的一些社会因素阻止。农民工市民化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在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却遭到各种社会排斥,产生了群体性挫折感。这些排斥包括:

1. 经济排斥

经济排斥是指个人、家庭和地方社区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农民工的经济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收入排斥。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水平比较低,从本次的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人的月收入在 500~1 500 元之间,2 000 元以上的只有 15.6%。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排斥。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很大。调查显示,有过 1~6 次变动工作单位经历的有 151 人,占 79.9%。在现代社会里,工作在人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没有工作,或者有工作但不稳定都会使人惶恐不安,在这样的状态下是不太可能对社会抱有信任态度的。

2. 政治排斥

政治排斥是指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政治选举权、社会保障福利等。在政治生活中,他们大多不能参政议政,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使得他们既没有利益代言人,也没有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成为被动的“无政治群体”。信任往往建立在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公正上,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导致农民工对政府、城市和市民的信任度降低。

3. 社会关系排斥

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社会

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由于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弱和城市居民的排斥,使他们固守于狭隘的交往圈,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在本次调查中,在回答“进城打工后最亲密的朋友是谁”时,72.6%的进城民工认为是“一同来打工的老乡”,17.2%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民工朋友”,只有 10.2%的人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城里人”。卢曼(Luhmann)认为,信任是建立在一定熟悉度及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系的基础上的。信任缘于熟悉,至少熟悉是产生信任的基础之一,而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少交往或不交往,彼此间很难熟悉,信任感也就很难建立。

4. 教育排斥

由于城乡差距和教育资源对城市的倾斜,导致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存在儿童失学、辍学现象,农民文化程度不高,造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在发展机会起点方面的不平等。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者占 82.7%。教育可以增强人们的判断能力,包括对他人的判断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会盲目信任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别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会影响人们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

5. 文化排斥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迁移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迁移的过程,是从传统农村文化进入现代城市文化。在这种文化迁移过程中,农民工面临着城市文化的排斥。在我国,“农村人”与“城市人”不只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城市人在自身优越感的驱使下,带着有色眼镜看待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外地人,认为农村人贫穷、落后、愚昧。对农民工的各种排斥性政策、城市舆论对农民工的负面宣传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群体间的偏见和歧视。祖克尔(Zucker)认为,社会同质性是产生信任的主要机制之一,人们会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一般来说,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异质性越多,越容易导致信任危机^[7]。农民工始终无法被城市主流文化接纳,是农民工产生社会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信任机制缺失导致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

1. 熟人关系约束机制失效

我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是“差序信任格局”,差序格局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网络是信任的有效保护机制,相互的亲密关系意味着相互的义务,

而义务感会使交往中的人采取守信行为。一个人如果不履行义务,失信于人,不仅会受到众人的谴责,还会失去关系网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资源。正是这种紧密持久的关系网络对人的约束作用,保证了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信任。随着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变得松散,关系约束的力量也逐渐减弱。同时,城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导致人们共有知识与经验的减少,利益失衡矛盾的增加。此外,城市化也加剧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人与人交往的匿名性和易变性,这都使得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建立困难重重。

2. 组织约束效力正在下降

传统社会下的组织约束主要指“单位约束”。在中国社会,“单位制”是“嵌入”在特定制度结构中的特殊组织形式。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 alker)从权威的角度提出了“单位依附理论”,认为在单位占有和使用经济资源的条件下,商品市场不发达,许多生活消费品都是通过单位分配给职工及其家庭的,所以造就了职工对单位的依赖^[8]。单位的这种控制形式构成了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特殊的社会信任——社会通过单位以默认的形式把成员纳入科层体系内,靠着外在的行政命令保障人们的诚实守信,使得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信任的状态。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组织约束的效力正在下降,人们不再把单位作为唯一的立身之所。很多人已经脱离了单位,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弱,因此,单位的社会功能在不断弱化,单位对个人职务范围以外的事务也不再负管理义务。农民工虽然进城打工,但始终游离于单位或组织之外,不受其保护,这是导致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

3. 道德约束机制弱化

道德同法律一样,是社会的控制力量,它以精神手段调整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通过协调和控制个人行为来维持有序的社会生活。社会道德调控能力强,社会一般会呈现出风气纯正、人际关系和谐、人心向善的良好局面。自然,整个社会的信任度也就会提高。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结构转变时期,道德对人的约束力正在逐渐减弱,因此信任的风险也提高。如果农民工轻信他人,很可能有上当受骗的风险。农民工 S 先生说:“我在合肥砖厂打了几年工,今年 3 月份,有个砖厂老板让我在老家招人到广州的砖厂干,并称工资待遇很高,每人只需交 500 元押金,来回路费都由老板负责。我们轻

信了老板的话,签了合同。到广州后,身份证、钱就被老板没收了,每天干活超过 12 小时,也吃不饱睡不好,而且一要求发工资,就遭到老板殴打。打工三个月,一分钱都没拿到。”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足以让农民工对社会道德不信任,产生恐惧感,进而封闭自我,逃避社会。

4. 制度约束机制缺失

制度是一种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它可以通过外在的压力,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是社会成员关系正常化、有序化的保证,是社会信任增加的重要条件。制度约束机制的缺失就是制度性承诺的乏力,这里所讲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制度,包括成文的宪法、法律和规则。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没有公共权威体制的社会必定是人们尔虞我诈、互相残杀的社会。在那种状况下,人们是无法彼此信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政府都有利于增进社会信任,至少政府应该奖励守信者,惩罚失信者。这就要求有健全的法制,在健全的法制下,失信的代价较大,这样人们就更可能对政府及他人产生信任感。当前,由于某些政府部门指导思想的偏差,在执行对农民工保护的法律时,对违法用工的企业、个人往往采取姑息态度。因为违法企业或个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他们便更加漠视法律,肆意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从而导致法律失灵,制度约束机制缺失导致农民工产生社会信任危机。

三、重塑农民工社会信任的路径选择

社会信任危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集结和激化的产物,它的弥散和扩展不仅不利于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社会和谐发展形成直接的威胁。从人文关怀或从社会理性的角度,重塑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工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 增加经济收入,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

社会信任同物质富裕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吉登斯认为,占有大量资源可以使人具有一种更加开放、更加乐观、更富同情心、更自在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可以增强对他人的信任^[9]。首先,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农民工收入水平也应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而增长。其次,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努力把供大于求的“力工”培养成供不应求的“技工”,是提高农民工收入的关键。最后,加快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建设,彻底将进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是增加农民工收入的重要渠道。

(二)健全法律制度,保护农民工权益

首先,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工作,尽快启动《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以法律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其次,增强农民工的法律维权意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益,促进农民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再次,强化执法和监查力度,对损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要依法及时处理,对失信于农民工的行为要追究其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从而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感。

(三)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

受教育程度不高,会影响农民工的理性判断能力和对社会的信任。政府应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建设,普遍提高农民工教育水平。同时,大力鼓励进城农民工在业余时间参加自学考试或到各类成人学校进修学习,在农民工聚居的地区成立“农民工职业学校”、“农民工进修学校”、“农民工之家”等,定期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

(四)引导非政府组织建设,为农民工提供沟通渠道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来自于个体间持续的规范化互动,组织则为这种互动提供了机会和场所。在组织内,通过个人之间的互动,以社会化的形式教会人们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能力与技巧,进而促进相互间的信任。目前,农工作为个体太分散,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少,功能不突出。为此,政府、社区、企业要积极引导和动员农民工建立诸如“农民工信息交流中心”、“农民工职业介绍与技能培训中心”、“农民工互助组织”等非正式组织,为农民工扩大沟通范围和增进信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搭建社会信任平台

信任往往建立在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公正上。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动机和目的,其他种种关系都受利益关系的决定和制约。公平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公正对信任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扩大社会平等,增进社会信任,政府应逐步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当前的重点是建设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并有效

地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最终建立起覆盖城乡、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六)建立和谐的社会互动机制,创造容纳农民工的文化环境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归根到底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因此,从根本上讲,要消除社会信任危机,就必须建立和谐的社会互动机制。首先,要调整并最终废除各种社会排斥机制。当前我国还有很多针对农民工的排斥性、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如单位制、户籍制。这些制度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互相隔离,沟通不畅,自然会产生不信任心理。其次,城市居民应努力转变思想观念,破除成见,消除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与歧视,认识到农民工对城市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使市民文化与农民工文化更好地融合,建立提高农民工社会信任水平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 [1] Coleman, Jame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J].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99-101.
- [2] 白春阳, 安文军. 社会信任的涵义及其分析维度 [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8(2): 30.
- [3] 沙莲香. 社会学家的沉思: 中国社会文化心理 [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364.
- [4] 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30.
- [5] 李伟民, 梁玉成.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 [J]. 社会学研究, 2002(3): 13.
- [6] 倡传振. 农村社会信任危机下的生长点思考 [J]. 理论与改革, 2007(2): 158.
- [7] Zucker, L. G.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In B. M. Stawe. & L. L. Cum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6: 53.
- [8] 边燕杰.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2: 11.
- [9]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J].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79.

[责任编辑: 孟丹青]